

论政治传播的历史性 ——一种哲学的审视

荆学民 祖昊

摘要

政治传播论域中有很多的问题亟需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度介入。单纯的政治学或单纯的传播学都无法准确地诠释政治传播。政治的“社会性”本质和祈愿与传播的“社会性”生成,使“元态”的政治传播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意识强化了政治传播主体地位的功能,加强了政治传播内容行动指导力的有效性,是政治传播框架构建特殊、多元政治话语和论述体系的基础,也是政治传播客体进行现实政治实践的内在要求。揭示政治传播的历史性,是对政治传播主体、内容、框架及客体认识的深化,是政治传播理论研究创新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政治传播、历史意识、历史性

作者简介

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祖昊,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为荆学民主持的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批准文号:11&ZD075)、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研究”(批准文号:15BXW059)的阶段性成果;中国传媒大学“优秀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To the Historicit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JING Xuemin, ZU Hao

Abstract

A number of issue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re currently waiting for the substantial answer from philosophy –based epistemology and mythology since neither politics nor communication can provide the all-around interpretation to them. The social essence and

objectivity of politics and the social generation of communication creat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s a crucial part in our life.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enhances the dominating position of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strengthens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contents, lays the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a narrative frame with the nature of plurality and stands a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objec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hen they pursue practices. Therefore, analyzing the historicit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s a new approach of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Political Philosoph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Authors

JING xuemin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ZU hao is a doctoral student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article is a Periodical result of the major project “A stud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trategy System” (project number: 11&ZD075) and “The Research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System” (project number: 15BXW059)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It is also a result of excellent innovation team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走进政治传播研究的“深水区”，却油然发现，只有将其提升至哲学的高度和深度，或者至少从政治哲学视野入手才能解决一些“所以然”的问题，否则，政治传播的研究就一直浮在以媒介为中心的“策略”表面，难以由表及里在“元理论”上有所创获。政治传播论域中有太多的问题亟需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度介入，本文仅选取“政治传播”与“历史意识”或者“历史性”，将其命名为“政治传播的历史性”从哲学角度进行初步的探索，以期获得更多的相关学术援助。

一、政治传播与历史性的概念内涵

政治传播不是“政治”与“传播”的机械组合，也不是所谓政治学与传播学在某个领域的“交叉”，而是一种深度的内在融合，因而，用单纯的政治学或单纯的传播学都无法准确地诠释政治传播，而只能从哲学深度上把“政治”与“传播”在“元态”根基上合二为一。我们已经多次诠释这个范畴，在此，再简练地归结为：政治的“社会性”本质和祈愿与传播的“社会性”生成，使元态的政治传播成为现实，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荆学民、施惠玲，2009；荆学民、苏

颖, 2014)。

元态的政治传播有多重属性。从政治学视域看, 政治传播有权力性、公共性、意识形态性等属性; 从传播学出发, 也有说服力、效果性和渠道性。那么, 什么是历史性? 一般而言, “历史”是过去发生事件的总称。我们通常说“历史”往往指“史料”、“史实”或“编年史”。但是, “历史”同时还是一种思维方法, 是人们由历史知识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的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徐兆仁, 2010)。人们借助跨越时空审视事物的思维, 在对复杂的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后, 把一切事物看成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并根据历史启示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理解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这种把过去、当下、将来结合起来的思维意识有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是实践性。自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提出“人类创造他们自己历史”之后, 人们认识到“历史一种创造的, 独一的无所不包又专门对人类种族而存在的过程”(阿伦特, 2011: 54)。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历史是人类具体实践活动的产物。历史的活动进程不仅生成了实践的构成要素, 也促进着实践的积累和发展。反过来, 实践的现实性和创造性则反映了历史的本质和内涵。因此, 历史和实践在本质上是互通、相互指代的。第二是流变性。历史意味着事物有过去、现在和将来或此时、彼时之分。因为时间、空间总是会不停地流逝、变化, 所以事物也在时空的维度上有不断变化、发展的意义和意义结构。¹

纵观西方社会的风云变幻, 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在政治传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古希腊时期, 由于追求普遍、永恒的哲学文化精神处于主导地位, 历史与历史性的思维始终遭到贬低和拒斥, 无法作为一种思维或传播工具与当时的形而上学政治相接轨。到了中世纪, 广泛传播的基督教“创世—受难—神罚”神性历史观, 在刻画永恒、神圣、万能上帝的同时把神、人与至善生活的关系以宿命论的方式联系起来, 让人从信仰主导的价值秩序中领悟自己的本质和命运。奥古斯丁正是利用这一“原理”, 把人间政治现实描述为人类原罪的惩罚, 并论证了人只有服从上帝和教会绝对统治、支配, 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并获得永恒的救赎。这种“教条主义式的历史阐释(dogmatic-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无疑是“历史”在人类政治叙事中一次完整运用。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 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出现了“主体性转向”, 人类社会的“进程性”和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当时资产阶级试图推翻神权和封建专制、夺取政权的社会背景下, 人们开始借助历史表达对现行制度的仇恨和对未来社会的渴望。例如, 伏尔泰把整个人类历史看

成是理性与迷信、知识与蒙昧的斗争过程。他认为,人受到愚昧思维驱动形成神的观念是对理性最无情的践踏。只有通过建立理性状态自由平等才是理想的政治归宿。孔多塞也把人类社会、政治现实看作一个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他看来,人天生具备使用知识、推动社会的进步的理性能力。随着理性的进步,它终将会战胜一切人类身上的枷锁并展现真理的曙光。这种把历史和理性、进步结合起来的政治叙事确立了政治活动是一种渐进的世俗发展过程,表明了政治现实历史变革的路径和可能性,同时克服了自然法或抽象理性勾画人类政治生活出现的机械化、静态化等问题。从十七到十九世纪,“历史”逐步发展成为“历史哲学”,开始从总体性的角度解释说明世间万物历史性存在(historical being)的特征和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方向,并在政治领域逐步为一种勾勒政治发展规律、政治进步和未来理想政治目标的方法论。历史哲学以有限、辩证的理性原则和目的论的基本导向诠释了政治现实向合理、更高、更成熟的阶段转化的可能性——人只要抓住历史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命脉与现实政治进行抗争,就必然能把自己从奴役和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至上、至善的政治归宿。这一点在康德、黑格尔以及后来马克思的政治叙事中有突出体现。

以上梳理说明,作为思维方法的历史与政治传播的叙事功能之间存有紧密联系。但对于政治传播的“历史性”,仅仅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还难以佐证。我们必须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元态”考察。现在政治学和传播学均把政治传播的过程规限为“主体—内容—框架—客体”这样的模型,其实,这恰恰是一种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视角。所以,我们就此借力于这个公认的模型深入其中,就政治传播中各个要素或环节的“历史性”予以论证。

二、政治传播主体的历史性

一般地讲,政治传播的主体是作为社会总体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国家,以及政治权力的代表(即政府和政党)。这些政治传播的主体都是人类政治实践的历史产物,因而从本质上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先从国家说起。作为保护社会、使其免遭分化的外在屏障以及人类特殊利益、公共利益和成熟政治生活状态的总体象征,国家是人类生存实践的共同归宿和共同诉求,是人类政治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最高体现和最高统一。它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威严性和不可侵犯性。如此来看,国家的内涵似乎是抽象化、实体化或“利维坦”式的。但事实上,国家的意义、性质和地位是人类政治精神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一种“动态化的静态体现”。我们知

道,人类政治精神始终跟随实践需要而不停变动、转化,而作为外在保障的国家必须跟上变化的步伐,不断地从理念的高度引导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走向更高阶段,以便促进更完善、更美好的政治生活的实现。正如黑格尔(Hegel,1961:269)所说:“国家是依照那些已经被意识到的目的和认识了的基本原理而行动,并且是根据那不只是自在的而且是被意识到的规律而行动。又因为国家活动的对象是现存的环境和关系,所以它是根据对它们的一定认识而行动的”。换言之,只有人类的政治精神得到完整体现,国家才能“具备”并“持有”自己的完整意义。

政治权力的代表(政府、政党)意义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紧密相连。一般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某种规范性(normative)的抽象前提预设,这种规范性能够以某种理性的原则或程序生产、形成权力活动的依据。但这种视角无法反映权力正当性与社会现实、社会需求在历史进程中的相互依赖关系(Thornhill,2008)。实际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社会历史(historical-sociological)的层面——政治权力是否“合法”,主要是取决于它能否适应社会进程的历史性变迁,抓住社会政治诉求的命脉,不断地在自身与社会的互动中进行自我调整(self-reflection)并重构自身的合法化标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经指出:“那些一般性(规范性)的政治观念,相对于合法性统治的历史形式而言,是非常抽象的。如果把那些规范性的东西作为统治社会的合法标准,那就意味着人会受到‘历史性地’不公正待遇。”(Habermas,1979:205)因此,只有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中,政治权力才具备更广阔、更有力度的诠释空间。

以上论证说明,所谓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历史性”,事实上是统治阶层以自身的历史血脉为基础,通过吸收、融合、服务于社会集体意向而不断完善并彰显自己权威价值的过程。传播这种“历史性”,意味现国家、政府、政党和社会能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为公共事务注入时代化的政治意义,并使其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不断传承、改造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现代政治的民主精神和法理制度十分强调统治阶层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发展互构,因而在政务和治理层面,国家、政府、政党的“历史性”是较为明显的。但在政治传播层面,彰显“历史性”意味着政治传播主体对社会事件解释能力的削弱,这恰好与意识形态的语言规则相冲突。正如麦克奈尔所见,现实中的政治传播往往选择了宰制媒体、单向宣传或强制灌输等方式输出自身偏好的政治理念、观点或价值,增加政治传播对象对国家权力的认可和对政府、政党合法性的肯定。这种方式需要对国家理念、国家的“大”与“小”、国家职能、政治权力合法性进行静态化的预设,因而是“非历史”的。诸如此类政治信息的传

播,不仅难以产生广泛的国家、政府和政党认同,而且极易将国家与社会的沟通关系异化为一种权力性的对抗或斗争,滋生紧张的政治气氛和消极的政治情绪。

国家、政府、政党的历史性是构建一个人政治存在感与社会存在感的根基。即便它的传播与关乎统治秩序的语言游戏格格不入,我们还是应该在这两种话语实践中找到一种张力。从国家、政府、政党的角度讲,要巩固自己特定政治环境中的根本地位,就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挖掘权威的基础,不断施行国家、政府、政党在未来领导中的理念和职能转换,并时刻保持自身与社会沟通交流上的自知、开明和绝对自信,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沟通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完整统一。

三、政治传播内容的历史性

作为传播内容的政治信息十分庞杂,包括关乎政治实践、政治制度、政治系统结构、政治关系、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心理的理论、学说、思想、意识和观念(荆学民,2014:95)。在受众对这些信息进行认识、反应,并形成特定政治见解、倾向和态度的过程中,政治信息本身的穿透力以及政治理论、思想、观念所表现的合理性,是决定政治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这种“政治合理性”往往涉及到政治价值、政治伦理、公共生活标准规范、权力与权利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尽管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但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政治合理性与人类某种先天的政治本性一脉相承。这种本性超脱了经验、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存在于人心灵之中的永恒、普遍和规则性的“结构”。它即可以生成人类生存实践的秩序,也可以对秩序进行解释,因而是人类政治思考和政治行动的基石。只要人类依照这些“结构”进行考察推算,就可以找到正确、合理、有效的政治原则。过去,人们曾经认为生产合理政治意义的“结构”就是理性。作为一种抽象思维工具,理性缜密和逻辑化的特征能够消除经验、直觉、意志、幻想等一系列主观思维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并带来相对稳定有效、确凿无误的政治见解。随着认识能力的不断增强,人们又开始把“结构”和科学等同起来,认为一切政治思考和实践标准都必须经得起科学推敲的东西。总而言之,以“结构性”为前提的政治理论、思想或观念,总要让政治的客观性和人类意识对政治事物的某种“整理”、“安排”联系在一起并“产出”政治的内涵。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政治的合理意义蕴含在人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人类通过长期实践积累政治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历史。这种历史条件的存在使人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成为一个有感性思维对象的具体存在者。只要人类把外部社会历史内容与自身主观能动性综合起来,就可以为未来政治的发展和变革提供实际走

向（王东红,2012:77）。在这种视域下，静态化的政治内容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政治现实和政治理想之间的历史张力。Koslowski（2005:100）概括的说，“历史性”的政治传播内容，表明“政治”的合理性要通过它自身的客观发展而获得实际意义，而人类进行政治思考表现出的精神结构和思维方式特征，无非是这种实践内在化的结果。

在政治传播中，“结构性”和“历史性”的政治内容有用途和效果上的明显差异。首先，“结构性”政治内容是人追求政治中寻求确定性政治生活的一种精神表现，它在提供稳定、普遍的政治理念，塑造特定政治价值、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的层面具备一定功效。然而，它用固化的标准规定政治内容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有意无意地把内容原理和“普遍”、“稳定”、“绝对”等同起来。毫无疑问，与之相应的政治传播必然带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色彩。“历史性”的政治内容则不同。它表明政治是人类不断实践的结果、是阶段性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成历史关联或发展节律的表现。“历史性”允许关乎政治的原理在时间维度中从上而下或从下至上的追溯，并向不断变化生成的历史—实践敞开，从而反映了一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政治态度。其次，本着“政治原则是关乎历史主体发展的多元化建构与重构”（Koslowski,2005:105）这一理念，“历史性”的政治内容充分彰显了政治实践活动中具体的人的中心地位。相反，“结构性”政治内容虽然也强调政治活动和作为政治实践主体的人之间的相符关系，但其抽象空洞“结构”说只是利用了大写、抽象的“人”的“在场”来塑造内容的真理性、正当性，从而造成了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缺席”。

树立普遍、统一化的政治理念，为政治实践主体提供行动指导力，是政治传播活动中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结构性”和“历史性”政治内容都不容我们忽视。但本着一种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视角，我们必须把“历史性”的政治内容置于主要地位，更要在界定政治传播内容上学会“历史”的思维。当今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造就了一个各种政治概念跨越时空限制遍地横飞的时代。有些政治思想之所以是“结构”的，并不是仅仅因为它们持以不证自明的真理论调，而是我们在没有深入挖掘其政治原则和我们自身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之前，就直接让被它们理性的、科学的、普世的或乌托邦的价值气味所吸引。认识政治内容历史性首先要明确政治概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必须理解“共性”要以特定政治地域的“个性”为基础才能进行延伸；其次，要学会在政治文本中发现具体、真实、历史的“自我”。从政治内容中运用脱离历史的自我意识或展开脱离

历史的自我想象,无疑都是虚无主义的表现。最后,政治原则并不是可以通过理性化、数学化、量化或精确化所能解释的东西。无论理性还是科学,都是人类在特定场域中的认知范式。用它们来勾勒政治事实,就等同于用人类头脑中的某些思维官能来代替人类本身。选择具有历史性深度的政治内容,学会审视内容的历史性思维,是做好政治传播内容定位和实践定位的关键步骤。。

四、政治传播框架的历史性

任何信息的传播,都离不开特定的传播框架。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说法,所谓“框架”,是“人们用来解释外在世界的客观心理模式以及归纳、建构与阐释现实生活的工具,同时也是确立、理解、归纳事件或信息的途径”(Goffman,1974:10-11)。与之相应,“传播框架”就是传播者对信息进行组织、选择和编码,使其展现特定意义所依赖的模板。在政治传播中,传播框架是对政治信息进行议程设置的标准。但用哲学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把传播框架深入地理解为一个关乎语言符号、表达原则、编码-解码关系和话语资源分配的政治表意系统。在政治传播框架中,“政治”的统摄和支配作用致使“框架”成为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的投射。这种主体意识带有劝服性、灌输性和倾向性、强制性和单向性,以支配受众为主要目的,尽可能地将自己精心标志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向受传者输送,试图让受众认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观点、政治价值或政治意识形态(荆学民,2014:43)。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政治传播框架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性质。首先是普遍性。为保证某种政治观点或政治价值得到认可,政治信息的论述体系或话语就必须打着“真理”、“绝对”、“永恒”等旗号在社会领域传播扩散。受到这些语词支撑和表意铺垫政治信息往往容易唤起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响应,并随之成为社会秩序的制度化、法理化和规则化依据或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正当理由(高宣扬,2010:49)。其次是排他性。一种政治表达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往往是检验其他话语方式的价值标准。它借助逻辑范畴或隐喻规则对其他政治论断进行否定或排斥,确保一套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价值免遭干扰和破坏。总得来讲,普遍、排他的政治传播框架能够编码出一套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公共观念。它以固定不变的逻辑、共识、普遍有效的规则来阐释世界,衡量一切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并作为一种法定的标准影响人们的表意规则(常士闾,2001:114)。借助利奥塔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这种政治传播框架归类为“元叙事(meta narration)”。

从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元叙事”模式的政治传播框架有四个明显的短

板。第一,是以暂时性替代永久性。“元叙事”把任何一种临时性的政治论述体系当作某种“永久性的制度”。每种特定的政治传播框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而“元叙事”意味着特定的框架可以超越并替代历史本身;第二,是以叙事性替代事实性。按照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观点,“元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游戏,是一种先在的话语公设。但政治系统却为了建立特定规则并使之生效,硬要有意让“游戏”为政治现实立法;第三,是用一元性替代多元性。用特定的政治话语囊括、解释所有的政治现象并使其模块化、符号化、议程化以及意识形态化,以至于“具有绝对固定的形式和不规则的词句弄得十分晦涩的语言,最终成为没玩没了的单调旋律”(利奥塔,1997:45)。第四,是以语用学原则替代主体性原则。它把政治话语的传播者、聆听者与行动者的角色和能力做了系统化的结构性预设,认为人会“循规蹈矩”地介入“元叙事”的每一个环节,却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面对现代人对“中心—边缘”模式的反叛以及对多元价值的需求,“元叙事”的政治传播框架已经难以发挥它原有的功能。它既无法再掩盖“真理”、“永恒”或“绝对”等意义的符号性本质,也无力再消解对立政治价值的“虚假性”,而是只能在价值对立巢臼中打转,或是成为消极、负面的话语霸权。在我们看来,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启动“历史性”的政治传播框架作为政治的论述体系与叙事方法。这种框架的基础是我们熟知的“主体—客体”过程性的认识模式——由于主体的认识能力始终受到现实社会因素的制约,所以任何主体都不可能剔除情感色彩和偏见去谈论认识的客观性。反过来,所有的事物也不可以用绝对化的方式来理解,所谓事物的“客观性”,只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相对的客观性,它随着时间的流变始终处于生成之中(沙夫,2014:73)。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历史性”政治传播框架的原则:一切政治叙事都不是以产出“普遍”、“绝对”或“永恒”等政治事物的客观性标准为目的,而是强调实践性的维度,把政治事物的论述当作历史的表征,试图在有限的时空环境下建立动态的政治话语系统,让政治原则、政治价值、政治规范等问题上以“相关性(relativism)”的方式表述起来。

“历史性”的政治传播框架,或者说相关性的政治叙事方法,本身就是政治传播当中一种方法论式的本质特征。但问题在于,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传播主体愿意让自己倾向的政治观点、政治原则或政治价值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不过,只有我们把一切政治理念的绝对性错误的等同于客观性,或是以绝对性的局限特征而否认其客观性时,“相对主义”的字眼才会出现。摒弃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我们

就可以发现“历史性”政治传播框架的适用性：第一，它把一切政治传播内容的客观性框定在“有限的客观性”这一范围之内，对政治的现实性和理想性做出了认知上的分层，可以有效缓解人们对“普遍”、“永恒”、“真理”等话语符号的责难；第二，它意味着政治话语和论述体系的构建可以切实地从具体的经验入手，使政治事物表述摆脱纯粹抽象价值体系的困扰并转向对具体情境中各种现实或可能的价值关系，分析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轻重缓急，审慎地评估各种价值要求的可能后果，并从历史与现实、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上进行价值权衡和选择（马德普,2005），从而避免了“元叙事”“以不变应万变”的政治“误构”；第三，它从历史辩证发展的角度摒弃了单一政治论述体系的霸权，意味着未来政治的构建存在多样化的想象空间，这就赋予了各种政治声音的合法地位，削弱了不同政治观点、理念和价值之间的对立矛盾，使政治叙事系统的多元构建成为可能（Koslowski,2005:100）。

五、政治传播客体的历史性

对政治传播的客体，我们经常以“受传者”、“用户”、“公民”、“政治人”或“公众”等词语进行定位。但无论是传播学领域所说能积极完成信息接受、改造并再传播的“受众”，还是政治学领域所说具有合群性、社会性，能相互合一及利益协调本能的“天生的政治动物”，都无法全然体现作为政治传播客体的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历史性。人是什么？用实践的眼光看，人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1976:243），“是生活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中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主体（马克思,1979:131）”。人类通过对世界的认识和创造，逐步给自身生活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基础。在人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历史也对人的创造活动有制约作用，它推进着人的本质发展，让人的本质在历史过程中得以发展实现。这种互为意义前提、产物和价值的性质，就是人的历史性（张尚仁,1992:370）。在政治领域，“人的历史性”意味着在一个彻底开放的未來政治探索空间面前，人除了历史条件的客观制约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外部力量的束缚，完全可以自由地根据自身政治历史、政治经验和政治文化的性质刻画未來的政治蓝图，让人从奴役和异化的生存状态中获得解放，让政治现实向更为合理、更高、更成熟的阶段转化并最终实现“善治”。

“人的历史性”是政治传播主体构建宏伟未來政治目标并实现政治一体化的重要依据。在政治传播中，特定的政治目标往往会等同与历史本身，使政治现实的发

展走上“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的轨道，从而激发人的理性和情感禀赋以及对崇高理想的信仰和崇拜。此外，特定的政治目标锁定了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也就意味着每个历史主体意义可以归结到（cognate with）“具有同质性的集体性历史意义”（Koslowski,2005:213）当中。因此，对政治的历史性描述不仅可以使人找到自己的历史感，同时还可以找到共同的历史归宿。这就为统合所有政治实践的人以及所有人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可能。

但是，历史总在不断地前进，人的历史性也在随之不断变化。首先，虽然历史性使人的政治生活虽然获得了自我探寻和无限创造空间，但历史只是创造、发展和进步的代名词，它无法向像传统根基那样为人们提供内在的（intrinsic）感性确定性基础。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每个历史主体都开始追寻独立、原子化的生活方式，同时让每种创造的意义之间产生对立和排斥。到了最后，“人们要么只能生活在绝望和分割的孤立状态下，要么被挤成一团……，虽然人类还彼此联系，但已丧失了曾经对所有人说是共同的世界”（阿伦特,2011:54）。所以，用特定的政治目标来掩盖历史本身带来的内在冲突，已经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举措。其次，历史在解放了未来政治，赋予人们“自由”这一目的的同时，也解放了实现自由的手段——意志。意志在本质上是一种力量，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控制，而且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汉森,2004:62）。当特定的政治目标被抬上历史的高度，不同的个体意志就在自由创造中相互碰撞，使得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成为了政治的主题并引发一系列政治矛盾和灾难。帝国主义的崛起纷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自由创造历史”的危险性。对此阿伦特（阿伦特,2011:75）悲愤地说道：“创造历史……让我们无论何时，只要听到政治上的宏伟目标，例如建立一个公正将永远得到保证的新社会，或为了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而战，或者使全世界都沐浴在民主的保护之下，我们就在这类思考范围内打转”。再次，人类的历史性本身也遭到了最激进的解构。一些后现代性思想指出，历史和人没有本质性的关联，而仅仅是一种虚构的想象。所谓的政治历史不过是构建政治话语的工具。它以各种个案为中介实现自我断言，把自己上升为一种激情、崇高的符号，教唆人们片面的把政治现实和虚假的历史以语用学的方式连接起来形成对政治理想的一元宏大预设。利奥塔对此评价道：“我们的政治历史上的大多数专名所产生的符号……让我们认为历史已经进行在前进的道路上……它不仅要求我们的情感中指向单一目的理念，而且根据这一理念，这种目的在于多元理念的构成和自由探索……(但是)一切不能满足单一目的的这种裂变的东西，似乎都不符合亦

不相似于这种裂变激起的情感中被给予诸种语汇的无限能力。”（汪民安，2000：300）

面对作为传播客体的人历史观念的变迁，政治传播也必须实施一些理念性的转变，才能确保政治在未来理想目标的导向上发挥积极的效果。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追求政治上的发展创造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合理走向。只不过，现代人已经开始把历史创造的意义放在了个体的层面，而不是共同体层面。那么对未来政治的传播，就不能从特定目标的理想层面入手，而需要从历史主体创造的现实层面入手，理清历史主体的各种政治关怀，提炼他们政治诉求的共性，按照“主流引导，多元共存”原则进行政治传播，避免目标导向和现实社会“不接轨”状况。其次，历史创造带来的政治灾难，是权力意志不断世俗化表现。权力意志的解放是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减缓它引起的政治冲突，就是要赋予每个历史主体把握历史、理解、解读与创造历史的政治权利。所以在政治传播中，未来政治应该被描述为历史的某种确定目标，而不是历史本身必然趋势、规律或结果。最后，对历史的解构，从表面上看是历史主体试图在一个无主体的、分散的、散步的、非中心的充满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中各自进行自己的“政治游戏”，但其实质是对政治历史的话语霸权的反叛。政治传播主体要实现对传播客体的整合，必须避免在未来政治目标的描述下太多功夫、做太多文章，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把理念付诸行动，用新的历史创造完善自己、沉淀自己，从而真正实现特定的政治导向。

注释 [Notes]

1. 除此之外，历史还具备观念性和目的性。前者意味着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产生对一般历史事实，对历史发展的原因、动力、主要线索、发展趋势，对具体事件、人物的作用、价值等一系列历史范畴的看法；后者则指明历史本身存有人类发展的终极动向和归宿。历史的观念和目的性主要集中在历史本体论的层面，由于这一点在20世纪人文、自然和社会科学中遭到的非议较多，不具备一定的普遍性，因此本文不再加以描述。

引用文献 [Reference]

汉娜·阿伦特(2011).《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61年).

[Arendt,H.(2011).*Between past and future(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61).]

常士闾(2001).《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Chang,Shiyin(2001).*The de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of politic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高宣扬(2010).《当代政治哲学(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Gao,Xuanyang(2010).*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Beiji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菲利普·汉森(2004).《汉娜·阿伦特: 政治、历史与公民身份》(刘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3年).

[Hansen,H.(2004).*Hannah Arendt: politics, history and citizenship(Trans)*. Nanjing: Jiangsu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93).]

黑格尔(1961).《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原著出版于1821年).

[Hegel(1961).*Element of philosophy of righ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821).]

荆学民(2014).《政治传播活动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Jing,Xuemin (2014).*The activity theory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荆学民,施惠玲(2009).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现代传播》,(4),18-22.

[Jing,Xuemin & Shi,Huilin(2009).The convergence of vision: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basic issues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odern Communication*, (4),18-22.]

荆学民,苏颖(2014).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79-95.

[Jing,Xuemin & Su,Ying (2014).The academic paths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in Chine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79-95.]

利奥塔(1997).《后现代状态》(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原著出版于1979年).

[Lyotard,J•F(1997).*La Condition Postmoderne(Trans)*.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House(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9).]

马德普(2005).普遍主义还是历史主义.《政治学研究》,(1)8-9.

[Ma, Depu(2005).Universalism or historicism .*Cass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9.]

马克思(197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27年).

[Marx, K. (1979).*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 of 1844*. Beiji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27).]

马克思,恩格斯(19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Marx, K.& Engels, F.(1976).*Se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Vol4*. Beiji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亚当·沙夫(2014).《历史与真理》(张笑夷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1976年).

[Schaff, A.(2014).*History and truth(Trans)*. Harb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6).]

汪民安等编(2000).《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Wang, Min' anet al.(eds)(2000).*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postmodernism*.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 王东红(2012).《历史与实践自身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Wang, Donghong(2012).*History and practice of self-motion*.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s Press.]
- 徐兆仁(2010). 历史意识的内涵、价值与形成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109-110.
- [Xu, Zhaoren (2010).The connotation, value and formation of history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109-110.]
- 张尚仁(1992).《社会历史哲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 [Zhang, Shangren.(1992).*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historical philosophy*. Beijing: People' s Publishing House.]
- Goffman, O.(1974).*Frame Analysi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abermas, J.(1979).*Commun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 Koslowski, P.(2005).*The Discovery of Historicity in German idealism and Historism*,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 Thornhill, C.(2008).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al Legitimacy. *Theory and Society*,37(2),165-166 .